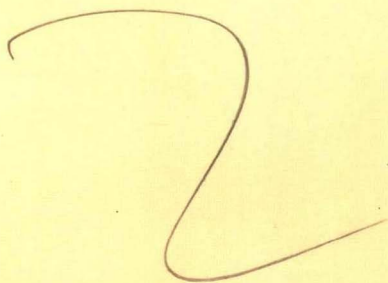


开卷文丛 第三辑

叶至善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为了纪念



I267/688

2007

为了纪念

三辑

叶至善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纪念 / 叶至善著. —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4

(开卷文丛. 第3辑)

ISBN 978-7-5355-5166-5

I. 为… II. 叶…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8400号

开卷文丛 第三辑

为了纪念

叶至善 著

责任编辑: 曹卓卓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n.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h.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32开 印张: 7.875 字数: 167000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355-5166-5

G · 5161 定价: 15.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面

去年四月，《开卷》的蔡玉洗和董宁文两位同志来我家看望爸爸，说《开卷文丛》已经出了第一辑十本，希望爸爸能有一本十万字左右的文选，参加到第二辑的十本中来。当时爸爸正在加紧赶写爷爷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他说，如果有可能，把他写的有关爷爷的文字辑成一本集子，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他腾不出手来。听了爸爸的话，我找出他的几本散文集，把文章选了出来，他抽空看了看说，有些篇史料性强了些，不宜放在文丛里。按爸爸的意思一筛选，要凑十万字就不够了，于是我们把这件事放下了。

去年八月，写了近两年的三十四万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终于脱稿了，可爸爸没有因此松下来。他看校样、设计封面……等一切都弄停当了，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爸爸累坏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八十七岁的爸爸终于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后来病情不断恶化，三月四日，医生给他用上了呼吸机。直到近一个星期，病情才稍稍

稳定。可他呼吸依然要靠机器，吃饭依然要靠鼻饲，不能说话，不能活动，短期内就是想做什么也不大可能了。这些天来，我和家里的人只是巴望着医生回天有术，能使爸爸的病情渐渐好转，恢复他该有的自由。更希望有一天，爸爸又能拿起笔，写那些他一直想写的好文章。

爸爸在病中，董宁文同志当然不会知道，二月二十三日又来信向爸爸约稿。我想，我该来完成爸爸想做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于是我把他近两年写的两篇：《叶圣陶集》两个版本的说明、《涸辙旧简》前言，以及他自己从《父亲长长的一生》中摘选出来的片断收进来，加在一起有十来万字了。而且这些事情和文字，一定是读者想知道的和喜欢看的。我又想，如果爸爸现在还能过问这本书的选编，他也会同意我这样做吧。

这本集子中的三十三篇文章，我把它们大致分成三类。一类二十二篇，是回忆；一类七篇，是为爷爷编书写的序、前言和说明；还有一类是四篇有关爷爷的童话的文章，这大概是我迄今能够见到的爸爸写的有关爷爷的童话的全部文字了，所以我想把它们收在这本集子里。

爸爸在《父亲的希望》这本散文集的自序中写道：“直到父亲过世，我才突然感觉到失去了依傍——七十年来受到的关心和教育，从此中断了。父亲的关心和教育似乎是无形的，像空气一样；我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可是从没想到，自己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今年大年三十，爸爸在医院里拿到了刚刚出版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就把书送给曾为爷爷和他自己开过刀的北京医院的老院长吴蔚然。他对吴院长说：“我父亲

对我的关心和教育使我受益终生，我应该写一本书来纪念他。”现在想起来，爸爸的后半生为爷爷编集子写文章，都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吧。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短文的题目是：为了纪念，于是就用它做书名。

叶小沫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

又及：收到宁文同志寄给我的《为了纪念》的校样稿，真觉得欣喜。一是这本书二〇〇五年编成，今年终于要付印了，只可惜父亲看不到了；二是今年三月份刚好是父亲离开我们一周年的日子，这本《为了纪念》又有了新的意义，就用它来作为对父亲的纪念吧。

再次感谢《开卷文丛》的同志们为这套文丛出版做出的努力，当然也包括父亲的这本书。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目 录

“五卅”运动中的《公理日报》	1
《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的诞生	11
七十年前的日记	18
关于语文教学的一席话	24
父亲的希望	55
教育	62
担心	66
题《五醉图》	68
海棠的缘分	71
送父亲到用直	76
《十三经索引》始末	79
改诗	89
怀念父亲的好友王伯祥先生	94
父亲提的修改意见	102
陪父亲喝酒	110

记未厌居	114
关于《文艺谈》	118
两本书的档案	124
至诚的“远游”	127
“五卅”运动和以后的日子	132
诗的跃进	135
最后五年	138
 编父亲的散文集	 148
《文心》重版后记	152
《叶圣陶读本》前言	156
《叶圣陶作品精选》序言	162
《叶圣陶短篇小说集》前言 ——为了纪念	 170
《叶圣陶集》两个版本的说明	178
《涸辙旧简》前言	185
 父亲的二十四篇童话	 198
骄傲的石像	216
稻草人和王子	225
傻子和绿衣人	235

“五卅”运动中的《公理日报》

“五卅”运动过去五十七年了，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还很深，虽然那时我才七岁。这并不奇怪，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是前所未见的，使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新鲜，感到兴奋。不论跑到哪儿——家里、学校里、街道上……强烈的爱国反帝的宣传都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使你感觉到这场运动有自己的份，因而走在路上也跟平时不同，觉着特别带劲儿。

每天上学和回家，我得走宝山路，从商务印书馆门前经过。那儿成了沸反盈天的地方。路边经常围着一圈一圈的人，那是有人在演讲。墙上贴满标语，还有漫画。漫画最有吸引力，害得我上学迟到了好几回。有写实的，画日本工头殴打工人顾正红，画英国巡捕向演讲的学生开枪；有象征性的，画一只老鹰在啄人，老鹰的身上插着一面英国国旗，画一只穿高齿木屐的大脚，腿上还长着不少毛，踩在工人身上。到处可以遇到扛着粗毛竹筒募捐的小分队，有些竹筒就锁在电



《公理日报》旧影

线杆上。捐款是为了支援罢工的工人。每天早上，我把母亲给的一把铜板扔进竹筒，听到铿锵的一声，心里舒服极了。我是知道的，那些日子母亲经常午后出门，很晚才回家，就是跟她的朋友去很远的地方，把竹筒里的钱分发给工人们。后来，父亲把她们的经历作为素材，写成了短篇小说《在民间》。

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有《公理日报》。每天上学回家，我都得经过郑振铎先生家门前。郑先生住在宝兴西里九号，这条弄堂在商务印书馆东边，是一排朝西的两开间的西式楼房。每幢楼房前面有用铁栅和铁门拦着的一块小小的园地。那些日子里，我早晨上学，总看到郑先生家的铁栅和铁门上扒满报童，重叠好几排，闹嚷嚷的，好像蜂房洞口的蜜蜂。一会儿，一叠又一叠的报纸从报童的头上递出来了。报童们分到

了报纸就分头开跑，一边跑一边喊：“《公理日报》，刚刚出版！《公理日报》，一只铜板！”好像满街都是他们的喊声。我羡慕极了。我知道，租界是不准卖《公理日报》的，谁手里拿着《公理日报》走过北火车站的铁栅栏，就可能被英国巡捕抓去蹲监牢。也许正因为这样，报童们跑得特快，喊得特欢，带着示威的劲头。我要是不用上学，很可能跟他们到北火车站去跑一趟，看看铁栅那一边的英国巡捕和英国水兵怎样对着他们干瞪眼。

还有个使我起劲的原因，我知道《公理日报》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编的。可是我毕竟只有七岁，没有正经看过这份日报，也看不懂上面印了些什么，更不会知道这份日报在运动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后来进了中学，在国文课上念到了父亲写的《在五月三十一号急雨中》，往后又听别人谈到那篇



叶圣陶与儿女的合影

至美（前左者）、至善（后左者）、至诚（后右者）

散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公理日报》。我问父亲，父亲说这份日报是商务印书馆的一班朋友编的，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几位先生出力最多，在运动中很受读者欢迎，甚至拥护。至于上面发表过哪些文章，他自己写过些什么，他记不清了。我想最好能找一两张来看看，请朋友打听了几个图书馆，都说收藏中没有《公理日报》。

直到去年秋天，我和弟弟至诚一同收集整理父亲的散文，有位热心的朋友听说了，不但告诉我们线索，还帮我们借到了《公理日报》的一份复印件，其中只缺第十三号。原来《公理日报》是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六月三日创刊的，只出了二十二号，六月二十四日出的就是“停刊号”。八开大小，每天四版。报头是四个楷体字，看笔致是父亲写的，他自己却认不准。报头下面印着一行字：“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参加联合会的团体先是十一个，它们是少年中国学会、醒狮周报社、上海世界语学会、学术研究会、上海通信图书馆、孤军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太平洋杂志社、妇女问题研究会、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后来添上一个中国农学会。十二个团体组织在一起，看得出来是临时性的，目的就是这次爱国运动发表主张；说得具体点儿，就是为了出版这份《公理日报》。

关于这十二个团体的政治倾向，沈雁冰先生在回忆录中作了分析。他说：“醒狮周报社是国家主义派，是右派。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和妇女问题研究会可以说是左派。”还说中华学艺社、中国科学社上海分社和其他两个杂志社都属于中间偏左。还有四个团体，沈先生没提到。那个通信图

书馆，我倒去过，记得在宝山路三德里，谁都可以去借书，包括像我这样的小学生。听父亲说，办图书馆的是一班小职员小店员，他们“赔饭贴工夫”，每天下了班去那儿为读者服务，那种作风似乎跟后来的生活书店有点儿渊源，肯定是个进步团体。至于少年中国学会，我从《辞海》上查到，李大钊先生是发起人之一，成员很复杂，有共产主义者，也有国家主义者。《辞海》还说这个团体“到一九二五年就停止活动”，这就错了，至少得把下限推到“五卅”运动之后。听父亲说过，科学社是早期留美学生的组织，学艺社是早期留日学生的组织，加上农学会，都是我国最早的做科普宣传的团体。总之，这十二个团体的联合，可以算是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组织了，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否已经出现“统一战线”这个名词。而且“反帝”这个口号，也不是十二个团体都能接受的。沈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说，“实际的编辑工作却落在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文学研究会会员身上”。可以证明我并没有把事情弄错，虽然我当时年龄还很小。

参加对外联合会的各个团体的政治倾向虽然不同，但是从发表在《公理日报》“创刊号”上的宣言来看，它们的态度是很激烈的。宣言对英国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的第一条是“收回全国英租界”，第四条是“惩办肇事捕头及巡捕，西捕头爱伏孙及其他凶手，一律抵偿生命”。在这次运动中，就没有别的团体这样提出过。代表上海各界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六月七日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也不包括这两条；《公理日报》立即发社论，呼吁“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这些都是以后几天的事儿。创刊宣言还提出要用实际行动迫使英国接受条

件，办法是：“一、全国实行排斥英货；二、凡在英国私人或机关中服务者，一律退出；三、全国不售任何物品于英国人。”并且说：“将此三项彻底的经济绝交之抵制方法坚持到底，使英人对吾人之要求全数照办而后止。”《公理日报》二十二天的斗争，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两件事进行的：一是坚持对英谈判，反对妥协和所谓的“调停”，二是抨击种种破坏对英“经济绝交”的活动。

《公理日报》态度激烈，大报不敢说的话，它敢说；大报不敢刊登的新闻，它敢刊登。所以一创刊，声誉就超过了《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大报。大报都是要赚钱的，又都在租界里，他们得维护买办资本家的利益，对帝国主义的暴行，至多只敢作客观的报道，当然不合已经被激怒的群众的口味。《公理日报》一再发表文章揭露大报那种畏首畏尾的态度，要求它们采取鲜明的反英立场，最咄咄逼人的一项是要求各报一致拒绝刊登英货广告，还陆续列表公布英货的商标和英商公司的名称；大报只好装聋作哑，弄得很狼狈。

《公理日报》除了刊登新闻、评论、通讯和读者来函，还有一个战斗性很强的专栏，叫做“社会裁判所”。专栏的标题下面有两段表明宗旨的文字：

我们为整齐步调，惩戒与人异趋的奸细起见，特辟这一栏。裁判官是全体同胞。读者诸君如有所闻见，希望提笔一判，寄给我们，在这里宣布。

但是被裁判的罪人有自己申辩的权利。在这里被提

及的，如其不服裁判，尽可来函剖白。只要他有坚强的证据，正当的理由，我们很愿意给他们平反。

举个例说：对于这次运动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的是上海总商会。《公理日报》除了发表社论抨击总商会，还在“社会裁判所”中揭露这伙买办阶级的阴险和无耻。惨案发生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赶回上海，声称他是来作“调人”的，要劝说双方不要各走极端。我父亲就用“秉丞”的笔名，在“社会裁判所”中发表短文说：虞洽卿竟然要在我们和英国的交涉中间充当“调人”，不知他的国籍是什么。他认为我们已经走了极端，言外之意要我们退让几百步。他的罪不可掩，问大家要不要他当“调人”。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六月六日刊出的。六月七日，《公理日报》上有条消息，说有人在虞洽卿家的后门口扔了一枚炸弹，没有伤人，分明是警告性的。这可能是凑巧，跟我父亲这篇短文并无直接联系，却可以看出，《公理日报》确实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愤慨，及时指摘了公然冒犯众怒的民族败类。

在看到的二十一天的《公理日报》中，我父亲以“秉丞”的笔名发表的文章一共九篇，其中号召捐款支援罢工工人的两篇社论，都与“左生”一同署名。这位“左生”是谁，父亲却记不起了。跟我父亲接近的朋友中，只找到沈雁冰先生用“玄珠”的笔名发表的两篇社论；郑振铎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都没找到。几乎有一半的文章没有署名，我想即使署了名的，也只是注明了由谁执笔罢了，意思还是大家的。郑振铎先生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能把朋友们团结在一起，文学

研究会要是没有他，成立就会困难得多。因而推想，《公理日报》能有这么多朋友赶早摸黑义务参加工作，郑先生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愈之先生极会出主意，《公理日报》有些做法，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很可能是胡先生出的主意。我特地去问过他，可是他也记不起来了。

《公理日报》的本钱是大家凑集的，售价实在便宜，一个铜板当时只合半分钱多一点儿，批发给报童大概只收三厘半，跟纸张费和印刷费相差太远，又没有广告收入作补贴，办了几天，凑起来的几百块钱快蚀完了。《公理日报》于是刊登启事，请求各界捐助。捐助人的姓名和捐款的数目逐日发表，还隔几天把收支情形向读者说明。这个主意真好，暂时解决资金问题还是小事，经济一公开，使读者觉得自己也参加了办报，因而更加关心《公理日报》的前途。看发表的名单，捐助的人不少，大多一元两元，偶尔也有几十上百元的。可是每天的纸张印刷费得八十余元，发行收入仅三十余元，还是入不敷出。经济问题就成了《公理日报》的致命伤之一。

六月二十四日，《公理日报》出到第二十二号，刊出了《停刊宣言》。宣言说停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除了经济出了问题，还有一个是印刷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公理日报》不能在租界上印，而在闸北区，每天能印两万张报纸的印刷厂只有两三家。这两三家中只有一家肯接这桩生意，其余的怕出了事儿受牵连，不肯承印。可是后来，连这一家也受到了官方的压力，不肯再印了。又说“此外尚有几种别的关系，但不大重要，这里不必絮说”。我猜想“不必絮说”实质上是“不便细说”。参加这个对外联合会的十二个团体，政治态度

本来不完全一致，它们之间的分歧后来越来越表面化，以至于不能再在一起办报了。

我这样猜想是有根据的。一九六四年秋天，我跟父亲去福建参观，在福州，有一位先生来探望我父亲。他走后，父亲对我说：“这位先生是在商务的旧友，从前是国家主义派，参加过《公理日报》的工作。有一篇文章，我用了一句‘打倒帝国主义’。这位先生说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公理日报》不该用。两个人还吵过几句。”我立刻想起父亲写的《英文教授》中有这么一段情节，父亲却连自己写的也记不得了。回到北京后找出这篇小说来一查，我没记错，父亲把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安排在英文教授董无垢身上了。我想，这倒是个塑造人物的实例，最好能把父亲当时写的文章找出来。现在果然找到了，是六月二十日出版的第十八号《公理日报》的社论，题目为“无耻的总商会”。南京路惨案发生之后，代表中小商人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决定在租界上罢市，好不容易坚持了半个月，使英国商人吃了不少眼前亏。买办资本家也受不了了，就以总商会的名义出面，决定在二十一日“开市”。我父亲于是写了这篇社论，列举总商会破坏运动的种种罪行，最后号召说：“打翻了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我们的步调才可以整齐，才可以打倒外来的帝国主义。”《公理日报》当初创刊时不提“打倒帝国主义”，可能是参加的各个团体有默契的。直到六月十七日出版的第十五号，社论中才第一次提出“打倒英国的帝国主义”。这时候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把持谈判的官僚和买办的洋奴嘴脸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对外联合会中的左派为了斗争的需要，不得不提出这个鲜明的口